经济日报 ECONOMIC DAILY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理论之声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王昌林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和国际形势复杂深刻变化作出的重大抉择，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新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与取得的辉煌成就，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深化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理论认识并在实践中更好地处理两者关系。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从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七大，我们沿着这一方向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上把市场化改革推向深入，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市场竞争机制和市场价格机制对调节产品供求、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得到充分发挥，对增强经济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论断，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新的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使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得到明显增强。

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能够满足10多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焕发出的神奇力量。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不完善、不成熟的，在一些方面仍存在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形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体制保证。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迫切要求。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迫切需要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比如，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需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激励企业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在要素市场体系建设方面，需要深化土地、户籍等制度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需要进一步突破制约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打造更有效激励科技创新、更有利于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的体制环境，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在监管体制方面，要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方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此外，还要加快形成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办法等。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无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还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激励机制和要素保障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加快形成高效规范公平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区域和城乡间的流动。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加快推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形成一整套既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国家根本利益，又具有高度开放性、能够推动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体制机制。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表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全面完整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国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和必要条件。建立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其中的关键内容。比如，在微观主体方面，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等；在宏观治理方面，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推动统计现代化改革等。总之，必须适应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求，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改革攻坚和制度型开放，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准确把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

总的来看，《建议》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对“十四五”时期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明确要求。

第一，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和关键在于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使作为国民经济细胞的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一方面，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切实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权益，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激发民营企业活力。

第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科学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是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预期管理，完善逆周期调节，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第三，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必须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更加彰显统一完整、权责对等、高效公平、公开透明等特征，更好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重点是要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更好发挥现代财税体制在贯彻国家战略、资源配置、财力保障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支撑。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的血脉，必须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保障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表现在商品市场组织结构、经营业态、交易方式等方面的不断创新，更突出地表现在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高度发展和不断深化，需要大力发展组织严密、结构完善、运作规范、监管严格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第四，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运转的基础。要围绕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现代化市场监管体制，着力疏通堵点，畅通市场循环，努力形成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的市场体系。关键是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夯实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优胜劣汰。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既包括促进土地等传统要素在城乡之间的统一融合、价格市场决定、自主有序流动和高效公平配置，也包括增强数据、知识、技术等新型要素活力，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添油助力。

第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要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强化政府在战略规划、宏观调控和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完善政府的服务功能，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放管服”改革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市场活力的战略举措，要持续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实施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新产业新业态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着力营造更加完善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理论驿站

数字贸易：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力量

□ 谭洪波 夏杰长

当前，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要驱动力的数字化浪潮蓬勃兴起，数字产业化规模扩张，产业数字化态势强劲，推动数字经济、数字贸易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贸易是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共同演进的产物。近年来，数字贸易发展迅猛，正在重塑和创新各类经济活动，全球价值链以贸易为纽带在全球范围实现资源配置，数字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正在成为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力量。

数字贸易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

总的来看，数字贸易既能通过数据流动，加强各产业间知识和技术要素的共享，引领各产业协同融合，带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也能带来颠覆性创新，催生大量贸易新业态新模式，重塑全球价值链。

其一，数字贸易推动更多服务和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是以有形产品或无形服务为载体的一系列上下游经济活动组合而成的价值链条，这些经济活动包括研发、设计、加工、营销、售后等，它们通过贸易相互连接，也通过贸易实现价值增值。价值链上的各个企业在对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权衡的基础上实施跨区域分工与合作。而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降低了价值链上不同环节之间的贸易成本，特别是大大降低了无形服务的贸易成本，促使价值链上不同环节之间分工更加细化并重新组合：一是原有的企业基于对效率的追求分离或外包出更多服务和生产环节；二是以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创造出更多的新服务和新产品，这些新服务和新产品又通过数字技术嵌入和改造原有的价值链；三是一些原来本地化特征明显的服务业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全面高效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因此，数字贸易推动数量更多和范畴更广的服务和产品融入全球价值链。

其二，数字贸易推动更多中小微企业甚至消费者个体融入全球价值链。不管是在生产性服务环节还是在加工制造环节，传统的全球价值链更多地被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型企业占据，中小微特别是小微企业参与度较低。而数字贸易则会改变这一现象，推动更多中小微企业甚至是消费者融入全球价值链。一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跨国贸易更加便利，中小微企业越来越能承受各类国际贸易成本，因此有能力承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个性化小规模订单。二是数字技术使许多生产性服务环节可分性提高，原本只能一家企业提供的服务现在根据不同服务的特点可以分包给众多中小微企业。三是数字贸易推动传统的大规模同质化批量生产向柔性化、定制化与个性化制造发展，这种制成品具有种类多样化、数量小型化的特点，因此需要众多中小微企业甚至是消费者自身提供中间服务和加工制造。

其三，数字贸易推动全球价值链同时向区域化和全球化方向发展。在数字贸易作用下，价值链的区域化将主要体现在制造环节上，而全球化则将主要体现在服务环节上。数字技术正驱使一些制造业向定制化、个性化、小型化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制造业产品快速及时地送达客户手中显得更加重要，这无形中对制造业的贸易成本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运用使价值链中生产性服务业的贸易成本显著下降，数字贸易使制造业对与上下游生产性服务业间的距离不再敏感，而对与客户间的距离和产业链安全更加敏感。为了使数字化的服务多跑路而消费者和有形产品少跑路，制造业往往更加考虑靠近消费者而不再主要考虑靠近生产性服务业等。因此，在数字贸易推动下，制造业趋向于区域化发展。价值链上的生产性服务业大部分属于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这类行业中知识和技术的投入与生产往往需要长期积累、试验、探索、总结分析并承担风险，因此它们的初始投入较大。而数字技术使这些行业的边际服务成本趋近于零，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更加显著。为了服务更多的客户，价值链上的生产性服务业借助数字贸易更倾向于国际化发展。

对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建议

人类社会正加速迈入数字经济时代。我们要牢牢把握新技术蓬勃兴起、数字经济顺势发展的机遇，加快推进以数字贸易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打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第一，以数字贸易为抓手构建国内价值链和新的全球价值链。从国内看，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以加工制造环节融入全球价值链，而价值链两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低。为了应对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的影响，应以发展数字贸易为抓手，打通国内循环的诸多堵点，加快构建稳健的国内价值链，以此畅通国内大循环。从国际看，除了继续加强原有全球价值链的合作之外，应在开放、共享、包容的原则下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特别是大力发展跨境电商，通过跨境电商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推动相关国家积极融入我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开拓国际分工的新局面。

第二，加大力度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是数字贸易赖以发展的基础，不管是构建国内价值链还是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都离不开数字赖以存储和传输的物质基础，因此应加快以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过程中，要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一方面，政府的作用在于加强“新基建”的规划引导，重在明确发展标准、统筹规划、监管监督、风险防范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打破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的各种隐性门槛，让社会资本放心、大胆地投入“新基建”领域。另一方面，要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通过市场机制带动“新基建”投资。此外，还要着眼国际市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方面的合作，更多从基建、产业、金融等方面综合考虑创新“新基建”投融资模式。

第三，加快我国各类产业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总体上还有大量企业仍未实现数字化转型或者说数字化程度不高。为改善这种局面，一是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应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经营管理者数字技能和数字意识的培训和宣传；二是数字化过程中特别是数字化初期，建议政府在税收和财政上给予中小微企业优惠和扶持；三是鼓励各类互联网企业在拓展自身业务的过程中带动与之相关联的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

第四，大力发展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不管是以有形产品为载体的全球价值链还是以无形服务为载体的全球价值链，数字贸易的发展都将促进更多的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其中。可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更多取决于其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和高端化水平。目前制约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高端化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体制机制方面，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我国生产性服务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内和对外开放，构建开放统一、有序竞争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为数字贸易条件下我国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五，积极推进数字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随着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数据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并且在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政策制定者、理论研究者和相关企业应共同加快数字贸易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既能保护数据安全、数据隐私，又能繁荣数字贸易的政策法规，为我国构建国内价值链、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提供理论依据和法制保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以数字经济助力新阶段高质量发展

□ 杜庆昊

眼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引发各领域、各行业的业务形态变革和产业结构重构，生产的网络化、智能化特征日趋明显，数字经济为经济领域转型升级提供了新路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定不移建设数字中国，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这为我们把握数字变革的发展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近年来，以信息技术和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其增加值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三分之一以上并持续增加，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催生新发展动能、激发新发展活力、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方面将大有可为。从科技发展趋势看，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为“十四五”时期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从疫情防控现实看，疫情防控推动消费和生产不断从线下转移到线上，以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协同生产等为代表的线上经济快速增长，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从国际国内环境看，主要国家都在加紧数字经济布局，国际竞争态势和复杂环境倒逼我国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总的来看，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有利于强化市场动力和产业支撑作用，而且有利于强化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间的纽带，是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数字经济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任务。数字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确保供应链安全、加快资源流转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生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有效打通国民经济各环节的堵点，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一方面，要加快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布局，提升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要鼓励“线上经济”“定制消费”等新模式发展，深挖国内市场潜力，为做大做强国内市场开辟新消费业态。此外，还要推动数字贸易发展，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技术交流、数据共享、市场贸易、信息消费等方面的合作，为促进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有效联通发挥纽带作用。

数字经济助力培育新动能。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数字经济的发展包含着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也是新发展动能的主要来源。一是着力加强数字经济关键领域和短板领域技术攻关，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维护我国产业链安全。二是大力发展以数字经济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支持工业互联网、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积极研发推广无人配送机器人等新产品，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层级。三是有效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继续保持消费互联网领先的同时，加快推进工业、服务业、农业领域的产业互联网发展，推进传统产业广泛应用数字化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和新商业模式，释放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叠加倍增作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数字经济助力释放新活力。经验表明，只有破除束缚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有效释放各方面的发展活力。总体来看，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精准化，交易手段的数字化、移动化，市场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平台化，有利于调动市场主体创新的积极性，是释放发展新活力的关键所在。一是加快释放数据红利，尽快建立健全数据确权、定价、交易、跨境传输和安全保障的制度和机制，破除影响数据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明确数据参与分配的具体办法，让数据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二是打造数字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全国政务服务“一张网”，在全国范围实现“一网通办”“一网可查”，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三是在稳步发展现有移动支付、网络支付体系的基础上，可考虑积极稳妥推动数字货币承担在计价、支付、结算等方面的货币角色，拓宽支付渠道，提高交易效率。

数字经济助力形成社会发展新局面。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在舆论引导、社会治理、疫情防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十四五”时期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发展新局面的重要保障。一是营造网络良好生态，发挥好互联网“助听器”“连接器”“扩音器”的作用，准确把握新时代群众需求诉求，有效疏导社会情绪。二是发展数字经济就业，要继续大力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生活服务业，支持发展各种就业保障平台，为灵活就业者提供就业和社保线上服务。三是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充分借鉴大数据、人脸识别、手机定位、二维码等技术手段在疫情防控中成功应用的经验，积极构建“城市大脑”“智慧社区”“智慧乡村”等数字社会治理平台，推动社会治理、基层治理走向精细化和智能化。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版编辑 欧阳优